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坚持学中文

靠死记硬背学习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祖籍海南文昌,但并没有在中文环境里长大。在家里,父母主要讲英语,偶尔夹杂一些马来语和方言。不过,黄循财的父母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一家人会一起看中文电视剧。电视屏幕上飘出的对白,算是他最早的中文课。

但电视剧能教的毕竟有限,黄循财是小学入学后才正式开始学中文。他回忆,自己学得很吃力,同学甚至会取笑他。他说:“我从小到大都在学校学习中文,也从小到大都在为学习中文而苦恼。”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在中学毕业阶段的成绩放榜时,他的中文竟然考了个最高等级的A1。谈及方法时,他说没什么秘诀,就是“死记硬背”。高中毕业

后,黄循财去美国读书,中文日益生疏。

弹唱中文歌曲

真正让黄循财重新捡起中文的,是从政。2011年,时任总理李显龙邀请黄循财代表人民行动党参选。从那时起,他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而中文,成了他绕不过去的一门功课。黄循财继续下苦功,长期请人补习。他总结的经验是:“要学好(中文),就是要敢去用。”黄循财开始弹唱一些中文歌曲,周华健的《朋友》就是其中一首。他说,自己会在选区活动中弹唱这首歌。

2022年担任副总理后,黄循财开始更认真地学习中文和马来文,还每周抽空上语言课。不过他透露,上中文课的频率比上马来文课低一些,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中文阅读和

写作的基础。和基层居民用中文聊天,他觉得自己“还可以”。但如果在工作时使用中文,比如用中文接受采访,或是在正式场合做更复杂的阐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我华语学习的下一阶段。”

用中文表达感谢

2023年8月,新加坡国庆之际,黄循财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身份,用中文宣读了总理李显龙的“华语版国庆献词”。有评论注意到,与从小接受中文教育的李显龙相比,黄循财的中文还“略显生疏”。黄循财也在采访中谈到,自己阅读、写作和理解文字的基础不错,但与一些从小在中文环境家庭中长大的朋友相比,他在口语上没有那么自信。

2024年5月,黄循财正式



“接棒”李显龙,成为新加坡第四任总理。就职仪式上,他用中文对“良师”李显龙表达了感谢。出任总理以来,黄循财仍坚持学习中文。在就职讲话、国庆群众大会等重要公开场合,他多次用中文发表讲话。

2024年8月,黄循财首次以总理身份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用中文发表演讲。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华语演讲中,黄循财更是提到,自己观看了潮州话版本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虽然只听懂一点点,但有一句听懂了:“阿嬷说的:做人要有情有义。”

(摘自《良友周报》郑立颖/文)

秦邦宪笔名“博古”的由来

秦邦宪在遵义会议之前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此后在为党工作的过程中,于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39岁,是“四八”烈士之一。

在秦邦宪短暂的一生中,曾使用过多个名字,除了本名“秦邦宪”外,“博古”这个名字最广为人知。

“博古”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一段经历有关。

秦邦宪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使用的俄文名为“Погорелов”,其正式的中文译音为“波格列洛夫”。

秦邦宪的一位同期同学在《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一文中说,学生的俄文名字是学校老师按照莫斯科电话簿中的名字抄来的,学生们的学号也是按照电话簿的字母拼音排列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不用绞尽脑汁去为同学们创造名字。

曾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叶帆在其《元帅和革命者的摇篮》一书中提供了《莫斯科中大学生完整名单》。从这份名单可以



看出,同期进入中大的大部分留学生的学号顺序都是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的。

秦邦宪留学中大期间,曾经参加各类组织活动,在中大支部局组织部工作一年,参加了组织部的大部分常委会及临时会议。在1929年支部局组织委员会会议的中文记录中,曾有16次出现俄文名“Погорелов”、19次出现中文名“秦邦宪”,说明那时他是俄文名与中文名混用的状态。

然而,在1930年1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出现了不同的俄文译名“博古列洛夫”;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的人名索引中,又被翻译为“波戈列洛夫”。一个名

字出现了多种译音的情况,只能说明有些译者翻译时的随意性,是由译者“赋”给秦邦宪的名字,不能算是秦邦宪的正式俄文译名。

秦邦宪于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于这期间党内许多同志也一同回国,很多人还是习惯叫秦邦宪的苏联名字 Погорелов,或叫其中文译名“波格列洛夫”。

秦邦宪于1931年9月成为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这一职务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毕竟当时只有24岁。他经常作报告,发表指导性文章,领导中国革命运动。但考虑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出于安全考虑常常需要使用化名。1931年12月14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附刊中的第五篇文章《在转变中》为秦邦宪所写,第一次使用了“博古”这一笔名。这个名字和他正式的俄文译名“波格列洛夫”前两个音节基本相同,“博古”类似于“波格”,而且有“博古通今”的深远含义。

(摘自《炎黄春秋》杨永涛、秦红/文)

1939年7月,日军侵占山西榆社县,位于韩庄的八路军总部修械所的工人只得背着设备打游击,这严重影响了八路军枪支的生产和维修进度。为了建立隐蔽、长久、稳固的军火生产基地,时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的左权经过几次实地勘测,决定将韩庄修械所扩大为兵工厂并迁到深山里的黄崖洞。

不久,左权与朱德、彭德怀徒步上山,察看八路军兵工厂的新址。当他们看到群山环抱、悬崖峭立、绿树丛生中仙境般的山洞时,不禁啧啧称奇。

朱德问:“这个洞能容多少人?”左权答:“至少三个连。”朱德满意地点点头,又问:“厂房建在哪里?多大面积?”

左权在几次实地走访过程中不但做了勘测记录,而且还根据地形地貌绘制了图纸。他让警卫员拿出图纸,胸有成竹地向朱德和彭德怀汇报:“我与同志们商量过,工厂总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建造12栋房屋,建筑材料用石灰、石块,就地取材。”接着,左权指着另一张图纸说:“最大的钳工房1000平方米,结构为两层,楼下生产,楼上住宿。”

彭德怀说:“选址很好,只是建厂速度要快,越快越好。根据现在的条件,需要多长时间建成?”左权略有所思:“力争半年完成。”朱德看完左权绘制的图纸,满意地说:“左权,你这个黄埔军校的高材生,我光知道你很会带兵打仗,想不到你还是个蛮不错的建筑设计师哩!”

左权的选址及设计方案顺利通过后,朱德现场授命左权具体负责搬迁和扩建工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一个初具规模的八路军兵工厂在大山深处的黄崖洞悄然建成。

(摘自《名人传记》张延安/文)

左权兼任兵工厂「建筑设计师」